

潜心学问,出学术精品

张 建 民

(武汉大学 历史学院,湖北 武汉 430072)

人文社会科学之繁荣发展,有赖于诸多高水平的、雕琢精细的研究成果即学术精品、传世之作不断问世。所谓学术精品,可能是开风气之先的力作,亦可能是对已有论题的进一步深化;其形式可能是煌煌巨著,亦可能是一二篇精粹论文。它不一定非要在短时间内产生“轰动效应”,有的甚至一时难以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,但它必须有创新,能持久。即在充分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,对研究对象的认识有突破性的提高或深化,增加了过去或原本没有的有意义的内容;或发掘、运用了新材料,或对已有材料进行了全新分析;或有新理论或新方法提出。“新”才是精品之结晶、核心所在。是否精品,能否传世,是学术界乃至社会通过较长时段的公共选择而最终确定的,经得起时间推敲,经得起历史和社会实践的检验。绝非自我标榜、托人炒作所能制造。

要出学术精品,出传世之作,最为重要的是学者能否潜心于学问。换句话说,学者潜心学问才能出学术精品。潜心之“潜”有很多用法,如潜藏、潜水、潜伏、潜移默化等。其中就以这潜心最难,因为它追求的是一种涵沉、静宁的心境,而做学问正需要这种心境。其实,潜心之说并无太多新异,古代先贤大多认为:“人心要深沈静密,方能体察道理。”程子更认定“性静者可以为学,若躁动浅露则失之矣。”明代著名学者吕坤论及治学时亦云:“把意念沈潜得下,何理不可得?”反过来讲,“将个浮躁心观理”,则一理难求。质言之,如果不能潜下心来,则难以做出学问。中国历史上有不少先贤潜心做学问的典范,见诸文献以“潜心”形容者如汉代大儒董仲舒,“遭汉承秦灭学之后,六经离析,下帷发愤,潜心大业,令后学者有所统一,为群儒首。”宋代如程伯刚著《春秋分记》,“杜门潜心,人罕识其面”。又如项安世“杜门潜心,起居不出一室,送迎宾友未尝逾阃,诸书皆有论说。”朱子论及读书,亦推崇“关了门,闭了户,把断了四路头,此正读书时也。”元代如李廉“闭户著书,故得潜心古义,不同于科举之学也。”明代如罗钦顺“屡召不起,家居杜门,潜心格物致知之学。”又如陈献章“杜门潜心大业,而道价响天下矣。四方学者日益众。”……时至今日,潜心向学似乎已成传统类老生常谈。但是,也许正是由于“潜心”二字只是常流于口头,显得太过平常,以致今人有意无意间看轻了它,忽视其必要性。更何况在社会转型时期,潜心学问实属知易行难之事。

潜心学问何以要“下帷”、“杜门”、“闭户”?一方面,进一步昭示了潜心之内涵:收敛心气、虚心涵泳、心无旁骛。“下帷”、“杜门”、“闭户”,都是手段或形式,目的在于排除杂念,摒弃干扰和诱惑,创造一种宽松和谐的氛围,求得一个静心专一的心境,即古人所谓“胸次放开,磊落明快”之读书心境。另一方面,足见“潜心”之不易,学者要有决心,有毅力,立定潜心之志。潜心正与浮躁、张扬、急功近利等心态不相容,而浮躁、急功近利之类,正是近年学术界产生诸多弊端之根源。治学之理,古今相通。先贤所揭示、倡导的“深潜笃实,方能制其飞扬之心,消其麓厉之气”,“心沉潜则造理必深,浮躁最害,轻儇亦然”等学问观念,至今仍不乏借鉴意义。

那么,如何才能使学者潜心于学术研究呢?当然,当今已非“杜门”、“闭户”做学问的时代,即使在古代,“下帷”、“杜门”、“闭户”,亦非惟一的潜心学问的手段。面对社会现实,要让学者愿意而且能够潜心做学问,一方面要靠相应的制度保障,通过制度安排为潜心做学问提供宽松的环境,营造潜心做学问的氛围,提供潜心做学问的条件。另一方面需要学者自律,“疏其秽而镇其浮”二者缺一不可。

制度安排包括学术研究的管理、评价、考核等方面的制度,亦包括相关的学术规范。有关制度建设的问题甚为复杂,具体到人文学科言之,有几点似乎应该明确。一是遵循科学研究、学术发展规律,给学术以相对独立的地位,给学者尽可能大的学术空间。创新是探索未知问题,应该尽量避免工程式、工厂式的管理、考评办法。人非机器,学问非铸造品,做学问亦不是生产线。潜心学问需要思考、解决问题的氛围、时间和条件,其间有不少因素是不确定的。二是尊重学科差异,纠正以国际化、标准化为由,不顾自然、社会、人文诸学科之间的差异,管理、评价、考核“一刀切”的偏颇。三是处理好集体项目和个人自选项目的关系。个性性强、标准一体化程度低是历史学等人文学科的重要特点,学者自己的学术兴趣、学术专长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学术研究成果的质量或水平。自主选题,个人钻研、探索的成果往往能够成为学术精品,因此,这种个性化研究理应得到尊重和支持。另一方面,国家改革开放、经济建设、和谐社会营造方面遇到的重大理论问题,却非个人研究所能完成,需要组织多个学者甚或多个学科联合研究。四是注重对学术成果的长期、持续影响力进行评价、鉴定,最大限度地检验学术成果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。人文社会科学的实质是对人、对人类社会的思考和解释,其间许多涉及对社会现象的价值判断和意义评价,要客观地对这类成果进行鉴定、评价,相当不易。有的研究成果在当年或当时若干年间未必产生“轰动效应”,其实却是该领域或有关方面学术史上无法绕开的成果,其学术影响持久不衰。相反,有些轰动一时的成果,尽管不乏奖项,也可能是“过眼烟云”,很快会被人们遗忘。至于那些有意标新立异、哗众取宠之作,更无须论矣。

制度保障之外,学者的自律亦非常重要,在这方面,中国学术有着优良的传统。前述诸家之所以能够潜下心来,自律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。对于人文学科而言,直观的感悟和体察是重要的研究方法,因此,古代贤哲治学亦非常强调治学与为人的统一,正所谓“诚正是为学根本”。这里的“诚正”,具有丰富的内涵,涉及对学者的人品、学风等多方面要求。人文学科注重积累,力戒浅尝辄止、粗疏浮躁、急功近利难出传世之作。古人云:“学者之所患,最是惰与轻。惰则自治废,轻则物欲恣。”天道酬勤,不经过艰辛劳动、思考,无法得到真正的创新成果。不疏秽镇浮、树立高尚的学术道德,难以抵挡名利的诱惑。“板凳宁坐十年冷,文章不写半句空”,可谓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要求和写照。王夫之云:“(治学)欲速成之病,始于识量之小。识量小则谓天下之理、圣贤之学,可以捷径疾取而计日有得。”是否浅尝辄止、粗疏浮躁,反映的不仅仅是学术态度、学风问题,亦是研究者学术眼光、学术水准的反映。关于学问重在求异创新,黄宗羲指出:“大凡为学,须要有所立……卓然有不为流俗所移,乃为有立……自立自重,不可随人脚跟,学人言语。”或以为古人著书不太讲究学术规范,其实不然。诚如北朝颜之推所言:“用其言,弃其身,古人所耻。凡有一言一行取于人者,皆显称之,不可窃人之美,以为己力。虽轻虽贱者,必归功焉。窃人之财,刑辟之所处;窃人之美,鬼神之所责。”诸如此类,都是当今学界需要继承、发扬光大的。

相信科学而切实可行的制度安排与学者自律相结合,能够营造出学者潜心做学问的环境和氛围,成为不断产出学术精品的源泉。

(作者系武汉大学历史学院院长,教授,博士生导师)

(责任编辑 吴友法)